



世界银行第四期技术援助项目

中国国家高级公务员市场经济课程培训能力的开发与研究系列教材

主编 周绍朋

经济安全：

Economic Security: Early
Warning and Risk Dissolution

预警与风险化解

主编 周绍朋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经济安全：

Economic Security: Early
Warning and Risk Dissolution

预警与风险化解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安全:预警与风险化解/周绍朋,张孝德主编.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ISBN 7-80140-436-X

I. 经… II. ①周…②张… III. 经济-国家安全-研究 IV. F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504 号

书 名 经济安全:预警与风险化解

作 者 周绍朋 张孝德

责任编辑 王 兵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电 话 (010)68920640 6892903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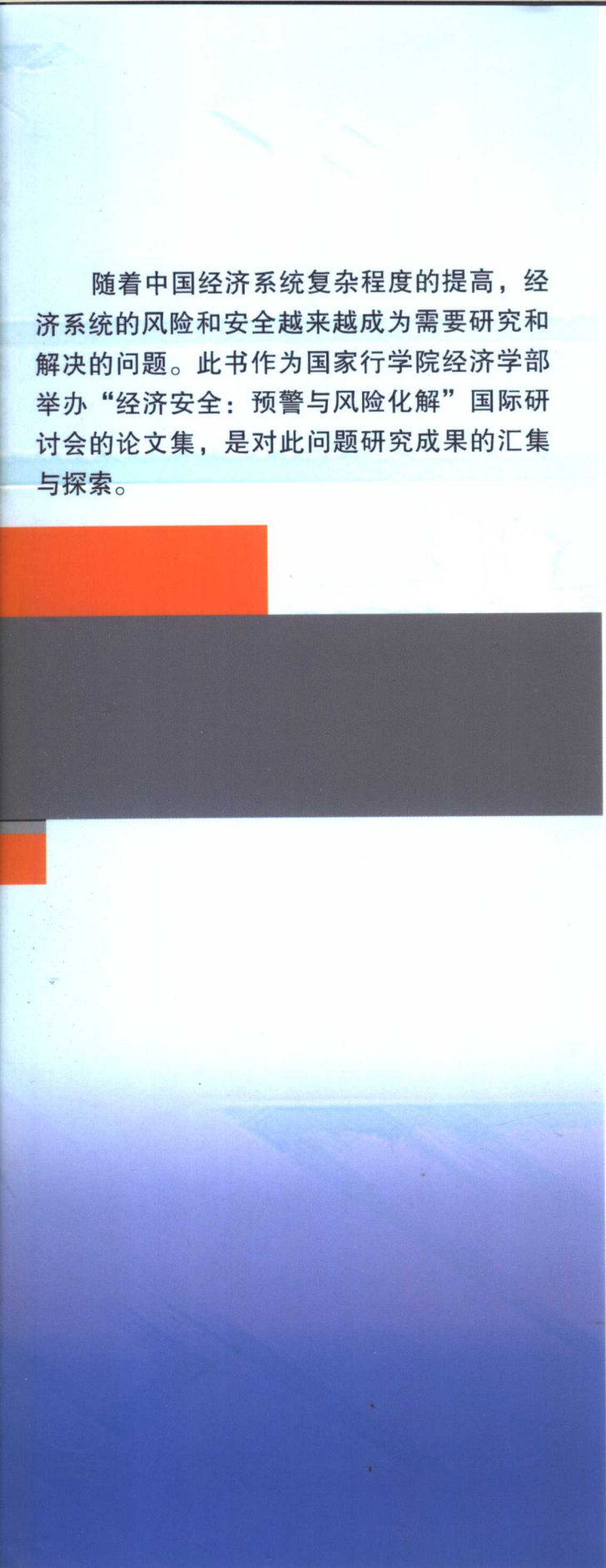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1.5

字 数 599 千字

书 号 ISBN 7-80140-436-X/F·42

定 价 63.00 元



随着中国经济系统复杂程度的提高，经济系统的风险和安全越来越成为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此书作为国家行学院经济学部举办“经济安全：预警与风险化解”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是对此问题研究成果的汇集与探索。



世界银行第四期技术援助项目
中国国家高级公务员市场经济课程培训能力的
开发与研究系列教材

主编 周绍朋

世界银行第四期技术援助项目
中国国家高级公务员市场经济课程
培训能力的开发与研究系列教材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唐铁汉

编委会副主任：周绍朋

顾问：唐铁汉 袁曙宏 楼继伟 许善达

王传纶 周叔莲 汪海波 何振一

吕 政 常修泽 K. Thomas Liaw(美)

Rainer Heufers(德) Xiaodong Zhu(加)

编委：唐铁汉 周绍朋 陆林祥 郎 加

王 健 汪海波 丁德章 许正中

张孝德



序 言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陈福今**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坚定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大胆借鉴并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在诸多领域逐步突破了长期以来计划体制的严重束缚,确立了竞争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并开始加以完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2004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13.65 万亿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数千年人类文明的东方大国,聚精会神谋求和平发展的努力,万众一心致力民族复兴的壮举,被国际社会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世纪”。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我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方式也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计划体制已被摒弃,初步建立了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努力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贸易规则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和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加快行政审批制度和垄断领域的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创新;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政府职能的转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进入 21 世纪以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中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规模总量越过 10

万亿元大关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系统显现出复杂程度提高、开放度加大和自我调节功能增强等一系列新的特征,并对我国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转变的迟缓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我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方式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迫切需要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从启动市场经济改革向服务、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迫切需要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的转变。

如何才能实现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要靠理论研究的突破,要靠实践中的体制创新,要靠依法行政,要靠公务员素质的提升,等等。这里就有一个系统学习市场经济理论,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作为培养中国高中级公务员、政策研究人才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重要基地,有责任有义务为中国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提供智力支撑和培训服务。在世界银行资助下,开发关于市场经济培训的教材和研究成果,正是适应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转变的需要而进行的工作。

由唐铁汉同志任编委会主任、周绍朋同志任主编的“中国国家高级公务员市场经济课程培训能力的开发与研究系列教材”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管》、《中国转轨时期的政府经济职能》、《监督制度创新》、《现代金融学》、《税收经济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税收》、《经济安全:预警与风险化解》等书,是世界银行资助的“中国国家高级公务员市场经济课程培训能力的开发与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个项目的实施,为国家行政学院深入研究市场经济理论和开发提升公务员执政能力的培训课程及教材建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套教材的编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注重系统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行政学院与世界银行在制定项目研究计划时,就明确将如何全方位提高中国公务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供系统的市场经济知识和培训教材确定为这个项目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课题的设计上,从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督研究,到转轨时期的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监督制度创新研究,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金融政策和监管到转轨时期中国财税政策研究等,所研究的问题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关键问题。这项研究成果的系统性,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知识结构上,也体现在每个分课题的研究上。每个分课题从本领域最基本的知识,到与管理操作有关的政策工具,从中国改革实践经验案例,到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比较,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既体现了系统的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和原理,也提供了经济管理中所需要的系统政策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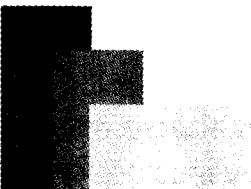
其二,体现前沿性。在整个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按照项目规划要求,不仅邀请了国际同行专家参加,而且课题组对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管理有针对性地进行实地考

察。这种开放性的研究,使课题组在对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管理政策和管理方式的比较上获得了前沿性的第一手资料。这个项目的超前性不仅表现在与国际前沿的接轨上,同时也表现在与中国经济前沿问题的结合上。在整个项目历时五年的研究中,始终对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新问题保持了跟踪研究,不断将获得的前沿性研究成果补充到课题中。如中国经济系统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在原来的课题设计中并没有直接涉及,但却是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要问题。课题组在结合中国经济现实的变化,将中国经济系统的风险防范和预警列入课题进行重点研究,还于2004年10月在重庆组织召开了“经济安全:预警与风险化解”国际研讨会。这些研究成果,弥补了原有的不足,也增强了课题内容的前沿性。

其三,具有适用性。这个项目是为国家行政学院培训高中级公务员提供培训课程和培训能力开发而进行的,由此决定了这个项目的超前性与高等院校的超前性学术研究有所不同。该研究把握的超前性是与适用性密切相关的,是从适应性出发的超前性,它所关注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与政府管理相关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经验的超前性。为了提高开发教材的适用性,课题十分注重在理论与实践、经济学原理与政策工具、国际的管理经验与本国国情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其中部分阶段性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学院培训课程的重要内容,并得到了学员的好评,有些内容还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修改和充实。

这套系列教材的出版,意味着历时五年“世界银行:中国国家高级公务员市场经济课程培训能力的开发与研究”项目的最终完成。按计划虽然项目工作结束了,但研究和合作并没有结束。今后国家行政学院还将对有关问题继续研究,并希望能够与世界银行、国内外专家的合作更加广泛、深入、持续地进行下去。在这套教材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国家行政学院对世界银行的资助表示感谢,对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和国家财政部对这个项目实施提供的咨询指导表示感谢,对应邀参加这个项目的国内外专家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

2005年5月19日



序

汪海波

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经济风险和经济安全都是一个突出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举办“经济安全:预警与风险化解”国际研讨会,具有重要意义,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这本书汇集的就是其中的最重要成果。

就宏观层面经济风险产生和变化的视角观察,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风险大致有以下三类:一是与改革开放相联系的新产生的风险。如国有企业改革和对外经贸关系方面的风险。二是原来就有的、但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到位相联系的趋于加剧的风险。如财政、金融和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风险。三是原有的、但与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相联系的趋于缓解的风险。鉴于第三类风险在本文集中没有涉及,这里拟以经济过热为例,做些简要分析。

如果我们以作为低谷年的 1999 年(这年经济增长 7.1%)为起点考察新一轮经济周期,就可以看到以下重要特点。第一,就周期的构成阶段看,不仅不会出现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相结合而形成 1961 年那种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27.3%),也不会出现由政治因素形成的 1976 年那样的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1.6%),而且也不会出现 1990 年那样的近乎衰退的阶段(这年经济增长 3.8%),仅仅由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7%~9.5%)运行的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构成。第二,在经济上升阶段,不仅在上升时间上是建国以后各个周期的最多年份,更是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



最多年份(年增长 $8\%\sim 9.5\%$)。^①在以前8个周期,上升阶段的上升年份(包括波峰年份)最多为3年,最少为1年;在合理增长区间的上升年份更少,最多为1年,最少为0年。而在新一轮周期,这两个数字均为4年。这是到2004年为止的数字。但依据目前的情况看,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年份至少还可以延续到2010年。第三,在这个周期的下降阶段,也将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线内运行(年增长 $7\%\sim 8\%$)。第四,就经济增速波峰年份和波谷年份的波动幅度看,不仅不会是已往周期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幅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波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也不会是中波周期(波幅在 $5\sim 10$ 个百分点),而是首次出现的轻波周期(波幅在5个百分点以内)。将上述四个特点概括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真正是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这在建国以后是第一次。

决定上述特点的有以下重要因素:第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第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第三,我国当前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第四,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多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这里所说的全过程包括以下四个阶段:(1)1992年~1997年积累了经济“软着陆”的经验。这期间经济增长率由 14.2% 缓慢地下降到 8.8% ,处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限(即 9.5%)以内。(2)1998年~1999年又积累了制止经济增速过渡下滑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下限(即 7%)以上。(3)2000年~2002年积累了经济缓慢回升的经验。这三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8% 、 7.3% 和 8.3% ,均高于1999年。(4)2003年下半年~2004年,又积累了治理局部过热,避免经济大起以及必然大落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9.3% 和 9.5% ,处于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限线内。当然,上述经验还只是初步的,需要发展与完善,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见。它是知识形态上的一笔巨额的、宝贵的资本,是我国今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第五,经济大国的效应。第六,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和国际和平环境。上述的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及其决定因素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这也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战略含义。同时表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风险的经济过热已趋大大缓解。

但这并不是说,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局部经济过热已经消除,更不是已经得到根治。因此,要消除经济布局过热,实现快速平稳持续发展,着力推进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并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继续

^① 我国改革开始以后的1979年~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9.4% 。这可以看作是潜在增长率。但它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其下限可以定为 7% ,上限可以定为 9.5% ,合理的增长区间为 $7\%\sim 9.5\%$ 。

并完善正在实行的政策措施,同时要对相关政策做出适当调整。

第一,要下大力气逐步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从价值(货币)形态考察,过高的投资率是投资膨胀在资金方面的基础。这一点,在当前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巨大规模的条件下尤为如此。当前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重化工业阶段,又要补偿多年积累下来的环保和生态建设的巨额投资。但现在的问题是:投资率长期偏高,而2003年和2004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7.7%和25.8%,大大超过了消费增长速度。于是投资率也上升到47.39%和51.33%。2004年投资率比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1960年还要高出15.59个百分点,比经济过热的1993年也要高出13.59个百分点,真正是历史新高!但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投资是多次发生的经济过热的第一推动力。投资率过高的另一面就是消费率过低。这就必然会形成局部经济过热与部分消费不足并存的局面。当前我国大部分消费品供求是平衡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供过于求的。这就是部分消费品不足的有力证明。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的原理,即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主要由劳动者消费构成的有购买力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的矛盾的原理,从一般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因此,如果听任上述局面的发展,终究会酿成严重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在降低积累率方面,当前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1)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企业投资的盲目性的叠加而形成的。针对这两种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包括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加快财税改革和建立公共财政以及干部制度改革等),加强依法行政,树立中央权威,广泛宣传科学发展来加以抑制;对企业投资的盲目性,则需要通过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诱导以及发布经济信息等手段,把他们的投资引导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去。(2)对与经济过热相关的(不只包括投资膨胀)引进外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规模也需做出适当调整。毫无疑问,改革以来,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适当的、巨额的外汇储备,对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防患金融风险,加强国家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均需要一个度。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已有议论。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使得这个问题凸显起来。2003年~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顺差依次分别达到了535.05亿美元和606亿美元,354.7亿美元和320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1168亿美元和2067亿美元。这两年增加的外汇储备比1978年~2002年增加总和还要多出379.4亿美元。这些因素无疑是促进这两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也不能说同



这期间投资膨胀、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通胀压力加大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不仅首先要花大力气在提高质量和调整结构上下功夫,而且还要依据有利地实现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规模上做出适当安排。

在提高消费率方面,当前要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这方面,当前有两个重点。(1)提高农村居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这是首要的重点。为此,一要依据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支出要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方面倾斜。二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科技兴农等措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可以逐步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提高城镇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为此,一是要积极扩大就业。这是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基础工程。这就需要提升就业率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当前还是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正确方针,就业率的重要性还难以同经济增长率相比,甚至还难以同通胀率相比。但又确实需要把提高就业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能仅仅让提高就业率单纯服从经济增长率的需要,而是要兼顾提高就业率的需要。而所谓兼顾又不能只是满足于把失业率控制在预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限度内。当然,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绝非易事。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要有条件、分步骤地把降低农村潜在失业率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并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然后在全国逐步推广。这实际上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极重要方面,并可大大促进就业。其次,在扩大就业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过低是当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最突出的表现。劳动成本低,在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企业的积累等方面都有好处。但它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克服内需不足。因此,必须逐步改变劳动力价格过低状况。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历史原因,有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原因,也有由法制不健全导致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当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要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要建立规范的劳资谈判机制,要发布和调整工资指导价,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发挥工会的作用,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二是提高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是消费倾向最高的两个社会群体,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就意味着从最主要方面提高了消费倾向。三是改善消费预期。为此,需要加速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包括养老失业和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快公共财政建设,并规范教育收费;建立健全社会 and 个人的信用制度,改善金融业的信贷服务,转变消费观念,以促进消费信贷有一个大的发展。

第二,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相统一(商品)形态考察,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不过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因此,要消除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

续平稳快速发展,还需要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为此,除了要把发展农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以加速农业的发展以外,还要:(1)适度地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即适当地以比工业增速更高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由来已久,当前已发展到很离奇的地步。在1952年~1978年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6%下降到23.7%。改革以来,到199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4.3%,其后10年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到2004年下降到31.8%。这并不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规律。诚然,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有统计低的因素。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其比重也是过低的。但从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的视角考察,从整体上说来,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在经济增速上升阶段,对缓和可能出现的投资膨胀是有益的。但它的就业容量大,扩大需求的作用大,在经济下降阶段,对缓解可能出现的内需不足也大有好处。发展以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两部分)为特征的第三产业还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重要条件。发展现代服务业,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服务业对缓解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压力也有重要作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但是提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为依据,还是以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已有强大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的。而且,在这方面,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是不同的。对第一产业来说,提出加速发展是可能实现的,但如果提出优先发展,则是不现实的。而发展第三产业则不同,从总体上说来,它不像发展农业那样,会受到土地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也不像发展工业那样,会受到资金、人才和资源的限制;而且生产门类极为众多,社会需求极为巨大,发展空间极为广阔,而我国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深化和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据此可以认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是能够做到的。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由于体制、战略和理论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在1952年~2004年的53年中,仍有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了工业(其中连续两年超过的有三次,连续四年超过的有一次),有6年接近工业(即增速比工业约低1个百分点)。这样,共有19年,约占53年的2/5。这一历史经验证明: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何况当前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还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提出这一点,也是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优先发展轻工业的经验。“一五”时期我国依据国内外形势提出和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后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片面推行这一方针,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改革以后,就采取了加快发展轻工业的措施。1980年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



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实际上就是推行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方针。这样,到80年代中期,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协调了。这一历史经验又启示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也是可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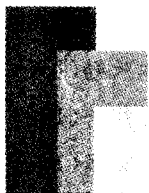
(2)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并相应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如前所述,到1985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趋于协调了。此后一直到1998年,都大体上保持了这种协调关系。1986年~1998年,轻重工业产值的对比关系是在46.3~49.4:53.7~50.6的幅度内波动。但在1999年以后,主要是2003年以后,这种对比关系又开始陷于不协调状态。在1999年~2003年5年间,轻工业产值比重由41.9%下降到35.5%,重工业由58.1%上升到64.5%。这一点同这期间重工业发展过快直接相关。这5年重工业增速依次为13.6%、20.1%、16.3%、19.1%、33.4%;依次比轻工业高出2.3、6.9、3.9、2.0、6、18.6个百分点;2004年又高出3.4个百分点。^①诚然,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工业速度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了。还要说明:1999年以后,重工业比重上升同统计口径变化也有关系。在这以后,工业产值的统计范围只包括国有和非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这就会在一定程度内降低轻工业产值的比重。但即使按同一口径计算,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也过快。在1999年~2003年5年中重工业产值比重就提升了6.4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一年就比上年提高了3.6个百分点。建国以后,每一次经济过热,重工业增速过快都成为带头年。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局部过热亦复如此。由于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就会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并由此引起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体制。但同重工业本身特点也有一定的联系。重工业产品除了满足其他产业、生活消费和出口的需要以外,相当大部分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具有自我循环的特点。因而在一定的时限和程度上,重工业增长并不会受到前一方面制约。这样,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趋于过热时,它会掩盖经济过热的程度,并成为促进和加剧经济过热的因素;而在下降阶段,经济趋于过冷时,启动重工业比启动轻工业又要难得多,成为延迟和延长衰退的因素。因此,当前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是治理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三,在推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的同时,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实行严格管理的土地政策。土地和资金、劳动力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理应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原本人均土地很少,土地是最紧缺的资源。而在当前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中,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的作用会提升,城镇化也

^① 《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页;《经济日报》2005年4月25日第9版。

会提速,其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在理论上说是这样,在实践上也是如此。1993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经济过热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特别是在把住信贷这个闸门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样,不仅制止了经济过热,而且于1997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首创。但从事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说,当时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把土地政策放到应有的地位;否则,其调整效果还可能更好一些。而面对2003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局部过热的情况,党和政府强调同时把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取得良好效果。可见,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完善土地政策,严格管理,在制止这次局部经济过热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大发展。

最后要着重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风险不只表现为局部经济过热,还存在多个领域,其中有些风险还在趋于加剧,并相互交织,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研究和防患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及其各个子系统的风险,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目 录

第一篇 国家经济系统安全与风险防范

准确界定政府职能边界 降低政府经济管理风险	周绍朋 吴 山(3)
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若干思考	张占斌(15)
中国经济转型风险预防与实施“内生增长模式”战略	张孝德(25)
经济安全的制度因素	张 旭(38)
中国能源工业市场化改革及能源安全	史 丹(47)
经济安全:理论思考与现实选择	黄 磊(58)
日本“平成恐慌”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张道航(68)
构建 21 世纪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	崔如波(78)
我国人力资本流失与经济安全分析	赵 莉(87)
政府高行政管理成本的风险及其化解	赵立波 于慎澄(96)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安全问题与对策研究	代春艳(10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长期稳定发展的研究	刘振江(114)
GMOs 引致的生物安全风险及其预警原则	蔡春红(121)

第二篇 财政风险防范与财政体制改革

公共财政、国有资产预算与风险防范	贾 康(131)
------------------------	----------